

回應萬毓澤教授的評論（一）

朱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書評對於一本書的潛在讀者是個重要的媒介。因此不僅相對於作者與編者獲得批評的期待，更因為讀者的期待而成為學術期刊上受到重視的文類。準確的閱讀、指出一本書的獨特貢獻及其侷限，是一篇書評的基本要求。萬毓澤對於汪宏倫所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的書評頗令我感到驚訝。這本由十篇論文構成的書，書評者僅提及了其中三篇，其餘七篇論文則隻字未提，沒有任何梗概簡介。這對於所評的《戰爭與社會》一書當然十分不公平，對於「書評」這個文類被期待的任務也頗欠適當。萬毓澤「書評」的四分之三篇幅在討論本書中我的兩篇論文之一：〈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或許獨立成一篇專評此文的評論是更恰當的體裁。以下我僅就相關這一篇（簡稱〈百年〉）的批評部分提出回應。

有時，對於批評賜教的期待，遺憾地失落為面對粗糙閱讀的無奈。舉兩處為例（以下以標楷體引述萬毓澤評論文字）：

其一，萬文評及：朱元鴻(2014: 137)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描繪為「有革命政黨的領導，能推動大潮、掀起內戰」，但主張建立革命組織與領導，並不等於主張進行武裝鬥爭、發動內戰。

然而，「有革命政黨的領導，能推動大潮、掀起內戰」並不是作者朱元鴻描繪馬克思主義革命觀的語句，而是作者引述一位評審的文字，整個脈絡是回應這位評審描繪「革命」的圖像。頁135的引文有引號，註腳7有說明，一點不曾馬虎，卻全都被萬毓澤忽略！

其二，萬文評及：引用俄羅斯右翼史家的暢銷書，將十月革命稱為「布爾什維克政變」，並謂其為記錄「導致災難與幻滅的政變歧

途」的「春秋之筆」（朱元鴻 2014: 137），就難免有「拿來主義」之嫌了。

然而，頁 137 萬文指涉的這一句，作者開頭明明就指「這些史家」（亦即《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俄國史家）還原政變的歷史細節以及下春秋之筆的意圖。更且，萬文指涉的這段文字緊接著的下一段第一句即是作者說明：「這段討論的重點不在於說服接受任何一方的歷史判斷，而在於提醒有必要檢視我們所因襲的革命意識型態」。萬毓澤忽略作者在文中區辨地發聲，而將作者陳列的觀點之一粗糙地混淆成作者「拿來主義」的判斷。

回應粗糙閱讀的說明令人感到累贅；不過，萬文夾纏粗糙閱讀所提出的一些質疑，必須耐心奉答。

萬文以一半的篇幅試圖解除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模式武裝鬥爭之間的關連。他的質問如下：

1. 首先，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武裝鬥爭？
2. 這恰恰是許多反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對中共政權（武裝鬥爭模式）的批評。
3. 至於把毛澤東的武裝鬥爭追溯至列寧，也大有疑問。

萬毓澤表示他擔憂的是關於「戰爭共產主義」的討論隱約用線性敘事取代了具體的歷史分析。但他的閱讀忽略掉的是歷史分析而真正掛念的卻是「思想史」上責任關連與否的問題。例如他提議：「如果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又例如他在註腳 2 提及：「早在 1920 年，托洛茨基便開始反省『戰爭共產主義』的錯誤」。萬文引述許多列寧選集、托洛茨基讀本、毛澤東選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文獻。但議論效果若僅及於否認思想史上的關連，諸如指出「認為革命可以仰賴軍隊而實現的概念，遠超乎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想像」，則萬文不僅錯認〈百年〉分析的層次，也使其貢獻的思想史文獻顯得不相干。例如〈百年〉（頁 120-123）即指出：「馬克思未曾想像共產主義在

非洲部族社會的實現樣態，非洲卻在 1969-1975 年間相繼出現了一波馬列主義一黨專政的共產政權」；並對於提出的問題：「爲什麼 1990 年之前，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對非洲許多國家特別具有魅力？」給予歷史分析而非思想史上的關連與歸因。

歷史分析與思想史上的歸因或否認，這兩個層次不相對應的經典例子，我們該不陌生：馬克思曾否認在俄國那樣工業落後的農業國家可能領先出現社會主義革命並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於是馬克思不曾預見的 1917 年俄國革命，究竟是馬克思思想的驗證還是否證？

萬毓澤問：「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武裝鬥爭？」，關切著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自「戰爭共產主義」黷武形象的歸責中挽救出來。這個問題其實有個關鍵的教義問答：列寧的 *Guerrilla Warfare*。這份文獻的第一節要義是：馬克思主義不受限於任何一種鬥爭形式，馬克思主義積極看待運動中任何的鬥爭形式，包括當時參與者尚未知曉的鬥爭形式。第二節要義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是階級鬥爭而非社會和平，當尖銳的經濟與政治危機成熟爲直接內戰，亦即兩派人民之間的武裝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進行內戰。¹ 不知萬毓澤是否滿意這段列寧主持的教義問答？

〈百年〉對於「戰爭共產主義」的歷史分析，既無意在「馬克思主義」的正典中尋求歸責，思想詮釋的否證也就不那麼相干。給個比方：二十一世紀的南亞、中東與非洲，經常出現某些伊斯蘭群體在遂行殺戮或自殺攻擊時高呼 Allahu Akbar！（真主至大！）於是對此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立場：一種認爲這些群體所呼喊的「真主」跟他們一樣殘酷可怕，另一種則爭論這些伊斯蘭群體根本不能代表他們呼喊的「真主」。這兩種立場需要藉著經典的詮釋與判教來主張或否認。然而對於這個廣泛頻仍出現於二十一世紀的現象及其社會的歷史分析，

1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4th English Edition, Second Impressio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edited by Clemens Dutt. Vol. 11, pp. 213-2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Available from http://jessbcuzz.weebly.com/uploads/8/4/7/2/8472357/lenin_guerrilla_warfare.pdf (accessed 30 December 2014).

伊斯蘭經典的詮釋與判教就未必那麼相干。我也認為馬克思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未必認同，甚至未必預見亞、非、拉美以馬克思主義旗幟進行武裝鬥爭及其建立政權、表現「戰爭共產主義」的方式。然而思想上不能盡然歸責馬克思主義，並不影響界定二十世紀「戰爭共產主義」的特徵，對其在俄國、亞、非、拉美一些實例所實現的不同程度與形式做歷史的分析。在歷史（而非思想史）分析脈絡下，我不認為俄國革命的內戰與毛澤東的武裝鬥爭有著萬毓澤所強調不可比較的根本差異；而他稱「革命前的武裝鬥爭」與革命後的內戰以及「戰爭共產主義」是不同的二回事，在我看來，隨案例不同他強調的這個畫分本身就指涉不明（請試就中國革命界定一下這個畫分）。同樣的，〈百年〉比較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並非在教義理論或思想上尋求關連。毛澤東鬥爭劉鄧走資派未必需要參考史達林鬥爭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但兩者類似模式，都是黨的領袖以對革命傳統忠誠為由對黨內異己派系進行摧毀性的整肅。

萬毓澤將〈百年〉論及由 Andrei Zubov 集結 45 位史學家完成二卷各千頁於 2009 年俄文出版的《二十世紀俄國史》標籤為「俄羅斯右翼史家的暢銷書」，稱其為「冷戰格局下」的「教科書詮釋」，再另提出 7 本書單，據他稱「已有力挑戰了『教科書詮釋』」，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並要求我提出明確的取捨標準。明確的取捨標準不難說明，其實也就是反駁萬毓澤在這裡輕率亂貼的標籤。二卷 1900 頁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迄今仍只有俄文版，在俄文世界之外引起相當高的興趣，書評裡爭議與褒、貶皆有，但我還是第一次碰到有人把他們扣上「右翼史家」這頂帽子。Andrei Zubov 集結的 45 位史家，包括一些任教於費城、巴黎、威尼斯的學者，在這部鉅著裡可以說都是在後蘇聯時代為俄國讀者寫作的俄國史家，而不是英美學院裡人們多已熟悉立場光譜鮮明的蘇維埃研究學者（如萬文推薦書單上的幾位）。不論褒貶的評者大多同意，他們最重要的貢獻即是書寫了跟蘇聯時代「冷戰格局下」的「教科書詮釋」大為不同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若萬毓澤並非時代錯置地指他們書寫的是蘇

聯時代的教科書詮釋，而是指他們的歷史書寫屬於英美這一邊「冷戰格局下」的「教科書詮釋」，那麼不也厚誣了這些以俄文為俄國讀者書寫的史家？

冷戰格局養成簡化二分的習性。萬毓澤依據刻板立場而慣性、不由分說地將西方的蘇維埃研究文獻，分屬對立二邊的書架。他分類的邏輯，我熟悉但不同意。他推崇「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的著作，在我讀來，想要矯正的是 Moshe Lewin (2005) 所批評「將蘇維埃體系史達林化」的傾向，亦即放大史達林的國家官僚主義而遮蔽俄國革命的其他面向。在類似覺察下，Rex A. Wade (2005) 與 Kevin Murphy (2005) 運用後蘇聯開放的檔案所進行的研究，我認為都是很有價值的貢獻。但在這些著作裡我讀到的非如萬文歸結的簡單訊息：「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他們各有自成一格的論題：Wade 的標題是《俄國革命：1917》(*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明確地指 1918 年 1 月 6 日布爾什維克以武力解散民主選出的制憲會議是「革命的終結」。Murphy 的標題是《革命與反革命：莫斯科金屬工廠的階級鬥爭》(*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革命指的是持續 1917 年理想的工人階級鬥爭，反革命指的則是他們遭遇到的史達林主義的蘇維埃國家，以及由國家官僚體系發展出來對立於無產階級的剝削階級。在我讀來這些研究跟萬毓澤對立起來的那些書單，若非簡化的意識型態好惡，在歷史分析上沒有理由不能相容。當然，《二十世紀俄國史》不能侷限於理想革命的 1917 年，也不能只研究四個工廠的檔案，於是我們聽到許多萬文推薦書單上聽不到的聲音：俄國東正教會與穆斯林群體的境遇，1918-1922 年抵抗紅色恐怖的鬥爭，在「階級敵人」標籤下被消滅的教師、醫師、牧師、商人、前公務員、大學生以及一般平民的婦女兒童，在布爾什維克當權下 1921-1922 年與 1932-1933 年二度因政治局決策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飢荒，異議運動，流亡者的證詞，以及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Perestroika)。這些聲音與萬文推崇的那些歷史研究一樣嚴謹地出於檔

案文獻的證據。英美學界仍有些內部習慣以“comrade”彼此稱呼的圈子，慣用「修正主義」或「右翼」這類標籤來反對不符合他們意識型態的研究著作，但我認為這二方的學者其實都無法否定另一方的證據不是歷史的一部份。若萬毓澤覺得某些聲音對馬克思主義理想的「俄國革命」很冒犯，因此將這些學者標籤為「右翼史家」，那麼我得說，肅靜掉這些聲音，閉眼不讀另邊書架上的歷史證據，「證明俄國革命是貨真價實的由下而上的群眾革命」這麼簡化的結論，只能是個布爾什維克神話！

在寫作〈百年〉之時，很清楚意識到將引起某些讀者的不安，我設想的許多是我熟悉的朋友。因此萬毓澤讀了表達「不安」，我不意外。不過對於一些企圖簡化這篇論文的批評隱喻，例如「隱約用線性敘事取代了歷史分析」，我不接受。〈百年〉直到結論都是以歷史分析呈現二十世紀兩種革命模式的歷史消長及其背景條件的遞嬗，並無一句命題簡單設定兩模式之間的線性轉換。第七節末段更保留了最悲觀與最樂觀之間的所有可能性，畢竟未來只能降臨，不能預見。至於〈百年〉被指稱有將歷史複雜樣貌「削足適履」的危險，我一時不知如何感覺這似有深意的批評，還是等萬毓澤將他認為的天足帶出來讓大家瞧瞧，我再來檢討我這可能嫌小的鞋子還不遲。